

南北“大妈”断桥相会话平安

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高晓岚

在北京中南海的红墙边,有一道红色的风景——红马甲、红袖标、红帽子,这“三红”是北京人最熟悉的“西城大妈”的“标配”;在杭州的西湖畔,也有一道靓丽的红色风景线,同样是红马甲、红袖标、红帽子,同样是问家长里短、护邻里平安,他们是杭州的“武林大妈”。

一北一南,相隔千里。但这两天,“西城大妈”和“武林大妈”却在杭州的断桥边相会了,而让他们千里相聚的,是一个共同的主题——“平安”。

再次相聚

相知无远近,万里尚为邻。“西城大妈”和“武林大妈”,其实早在杭州G20峰会召开前就结下了缘分。当时,“武林大妈”的代表曾多次前往北京向“西城大妈”取经,“生在国旗下,长在红墙边”的“西城大妈”将他们守护首都平安的秘诀倾囊相授。如今,杭州迈入了后峰会时代,作为杭州市域社会治理的特色品牌、“六和塔”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塔基的一部分,“武林大妈”不仅守护了一方平安,其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社会组织,自身也迅速发展壮大,从最初的18人团队发展为如今4.2万余人的“大部队”。平安志愿服务怎样更好地发挥作用、如何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,“武林大妈”向“西城大妈”伸出了橄榄枝,于是有了这次在杭州的又一次相聚。

前天,远道而来的“西城大妈”代表刚下火车,就来到“武林大妈”平安志愿者服务中心,并和“武林大妈”一起前往断桥边发放平安志愿者倡议书,共同向

西湖边的游客和市民宣传平安。难得的相聚,南北“大妈”们特别珍惜,一路上热烈交流着守护平安、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。

昨天上午,是本次互动交流的重头戏——“武林论安”2018平安志愿服务高峰论坛。论坛是上午9点半开始,但8点半时,头戴红帽子、身穿红马甲的大伯大妈们就纷纷入场。他们来自杭州下城区的不同街道,东新、朝晖、长庆、潮鸣……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——“武林大妈”。

家住杭州东新街道德胜东村社区的“武林大妈”吕笑玲,早早地和同伴们来到了浙江展览馆,并认真地在展览馆入口“武林大妈”和“西城大妈”对话互动交流活动的背景墙前合影。“不同平安志愿者队伍之间的交流以前也有,但这种跨区域的高峰论坛和现场互动交流还是第一次,很有意义。”吕笑玲说。

“西城大妈”们也都来到了会场,他们中有来自美国的网红“洋大妈”高天瑞,有四代都是“西城大妈”的王慧力一家,有热心社区小事三十年如一日的柳素霞……

共话平安

“每一代‘西城大妈’,都有那个时代的故事。”王慧力和大家分享守护平安的时代变迁和体会时说,这次和她一起来杭州的,还有她的母亲和女儿,因为她们三代人都是“西城大妈”。而她们家更早的“西城大妈”,是王慧力的爷爷,那时的“西城大妈”以老人为主,社区工作的分类没有现在全。到王慧力的母亲这一代,“大妈”主要管的是卫生和治保。而到了王慧



力的女儿时,大数据管理和精细化分工让社会治理变得更加快捷有效。

“只要你穿着这一身红马甲,就有很多人过来寻求帮助,这就是信任。”王慧力说,因为这份信任,她和很多“西城大妈”一样,愿意把人人参与守护平安的责任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
“2016年,我第一次接触‘武林大妈’时,就被这个热情洋溢的团队吸引,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,并成立了工作室。”作为“武林大妈”的一员,罗睿琦也向“西城大妈”们介绍了她加入队伍近三年来的变化和感受。

3年来,“武林大妈”们活跃在杭州的大街小巷,参与平安巡防50余万人次,报送各类隐患信息2.97万余条,提供志愿服务时长达70余万小时,参与纠纷调解1.04万起,成功率99.8%,涉及金额2.6亿元……这支队伍中,除了国家级心理注册心理咨询师、罗睿琦工作室主理人罗睿琦,还有鲍大妈聊天室创始人鲍倩、三和交流室负责人周鸿英、老李调解室“金牌调解员”李明海……因为无私奉献、默默付出,他们在杭州人的眼中,是比“远亲”更叫得应的“近邻”。

“我很自豪,因为我有一个闪亮的称号——‘武林大妈’!”罗睿琦说出了所有“武林大妈”的心声。

新时代 “枫桥经验”的 “浙检答卷”

(上接1版)

“这在浙江的检察机关已不是个例。从刑事和解到检调对接,到民行调处,再到申诉调处,矛盾纠纷就地化解、多元化解,已贯穿于检察办案的全过程。”有着多年信访工作经历和化解复杂难案经验的刘树枝说,“枫桥经验”的核心要义是源头预防、矛盾不上交,近年来,我省检察机关不断深化涉检涉诉信访机制改革,充分发挥基层检察院矛盾化解桥头堡作用,推行月通报和信访责任制,促进社会矛盾源头治理;深入开展积案化解,重点排查梳理一批重大疑难复杂的信访“骨头案”,省市县三级检察院联动,领导包案,限时办结。

“我们还积极发挥申诉办案的矛盾化解功能,综合运用瑕疵补正、释法说理、公开审查等多种举措,努力实现最佳办案效果。”刘树枝说,与此同时,浙江检察机关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个案化解和代理申诉专项活动,发挥援助律师工作站的作用,引导律师参与接访处访、案件评析、公开听证等,有效促进涉检信访矛盾化解。

一起起小案的化解,促进的是社会大和。比如,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诉调中心把“联合调处模式”延伸到刑事诉讼检察领域,4年里依法促成刑事和解后依法对53人作出不起诉决定,和解后均未发生缠访闹访、申诉上访等情况;诸暨市检察院检调对接和解工作室近3年来成功和解案件282件,为困难被害家庭申请发放救助金33万余元……检调对接不仅化解了矛盾,更春风化雨,传递了司法的温度。

“智慧检务”强检利民

“一体化”办案系统加速全省政法工作深刻变革,全省三级检察院统一挂牌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暨12309检察服务中心,打造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的浙江检察机关“最多跑一次”……我省检察工作的这些亮点令人印象深刻。

“这都是‘智慧检务’的功劳。”刘树枝说,以省检察院牵头建设的“一体化”办案系统为例,这个系统不仅打通了数据壁垒,还实现了办案的网上协同,目前效果已经显现。

作为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法律监督、深入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,全省检察机关挂牌成立公益损害与诉讼违法举报中心暨12309检察服务中心以来,已接收举报线索2996件,通过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、检察建议等方式纠正整改206件,“群众举报热情更高了、更方便了,检察监督也更‘有料’了。这也是‘枫桥经验’发动和依靠群众的要义所在。”刘树枝自豪地说。

在深化检察环节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过程中,我省检察机关将群众“最多跑一次”向检察官“至少跑一次”转变,要求检察官在办理重大环境污染案件、涉非公企业案件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案件时,必须“亲历性”办案,走到百姓身边了解案情、听取意见、释法说理……

“我们践行‘枫桥经验’的一切努力,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”刘树枝说。



海关“应考”

“双11”临近,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区已是一片忙碌景象,杭州海关的关员们也忙个不停。“双11”是一场消费者的“盛宴”,也是对海关通关效率的一次“考验”。图为海关关员在检查跨境进口商品。

通讯员 胡涛 朱程莹 文 李晗 摄

勇当坚持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排头兵

(上接1版)

那么,如何进行转换?在毛善恩看来,必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。而这,也正是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核心和灵魂所在。

55年来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“枫桥经验”不断创新,经历了从社会管制、到社会管理、再到社会治理三个发展阶段,形成了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,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新的飞跃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“实现新飞跃的根本方法,是推进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融合。”毛善恩介绍,2013年,桐乡市就开始探索实践“三治融合”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,开辟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新路径。

与此相辅相成的,还有全省各地不断成长的社会组织,先后涌现出“红枫义警”“乌镇管家”“武林大妈”、杭州上城公民警校等一批典型,他们在矛盾化解、社区矫正、帮扶救助、慈善公益等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,浙江省共建共治共享的基本格局正在渐渐形成。

数据无声,却是“浙江样本”的最佳注脚:国家统计局实施的全国安全感抽

样调查数据显示,这15年来浙江省受访群众的安全感满意率逐年走高,从2003年的90.8%上升到2017年的96.58%,连续14年位居全国前列。

“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和发展‘枫桥经验’15年来,也是‘平安浙江’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15年。”毛善恩说,坚持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,浙江群众收获了满满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谱写新篇

站在新起点,回望“枫桥经验”的形成、发展、深化历程,55年来“枫桥经验”的内涵不断丰富、作用日益显现。“我们还开展了‘向枫桥派出所’学习活动。”毛善恩介绍,全省公安机关目前全面推行枫桥警务模式,实现警务理念新转变、警务手段新突破、警务方式新拓展、警务能力新提升,培育一批“枫桥式基层所队”,绘制“亲民尚和图”。

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创新发展中,也包括了浙江公安机关的未来规划。

浙江公安机关将以增强预测预警预

防各类风险能力为着力点,以全面深化公安改革、大力实施公安大数据战略为动力,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,坚持专项治理、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依法治理、源头治理相结合,高水平建设风险防范化解体系、基层社会治安治理体系,不断提升平安浙江建设的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水平。

与此同时,浙江公安机关还将夯实基础、筑牢防线,着力健全完善基层现代警务模式:打造一个统一的网上警务服务平台、织就一张全覆盖的警务工作站服务网、建设一支“忠诚、专注、贴心”的民警队伍;建立全日制警务机制、全方位服务机制、警民沟通互动机制、治安防控体制、警民协作机制、矛盾纠纷联调机制、科学考核机制。

在毛善恩看来,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主力军的公安机关,浙江公安理应干在实处、走在前列、勇立潮头,以排头兵姿态,担当起坚持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职责使命,在更深层次、更广领域、更高水平上推进平安浙江建设,努力建设平安中国示范区,为浙江“两个高水平”建设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